

魏晋南北朝卷

归青曹旭著

中国诗学史

鹭江出版社

陈伯海 蒋哲伦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诗学史．魏晋南北朝卷 / 陈伯海，蒋哲伦主编；归青，曹旭著．—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9
ISBN 7-80671-135-X

. 中 陈 ... 蒋 ... 归 ... 曹 ...
. 诗歌史 - 中国 - 魏晋南北朝时代 .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0712号

中国诗学史

魏晋南北朝卷

陈伯海 蒋哲伦 主编

归青 曹旭 著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22号 邮编：361004）

人民日报社福州印务中心印刷

（福州市鼓屏路33号 邮编：350001）

开本 890 × 1240 1/32 9.5印张 4插页 214千字

2002年9月第1版

200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71—135—X

I·33 定价：20.00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中国诗学史总目



Z O N G M U

中国诗学史导言 （陈伯海）

总论：中国诗学观念的流变 （陈伯海）

先秦两汉卷 （翁其斌）

魏晋南北朝卷 （归青、曹旭）

隋唐五代卷 （倪进、赵立新、罗立刚、李承辉）

宋金元卷 （黄宝华、文师华）

明代卷 （朱易安）

清代卷 （刘 诚）

词学卷 （蒋哲伦、傅蓉蓉）

后记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中长期课题研究成果之一。全书共分七卷，前六卷按历史朝代分编，起于先秦，迄于清末，每卷详述一个时期的诗学状况；另设《词学》一卷，综述词学的发展历程。本书以诗歌理论的演进为经，以诗歌的各类活动为纬，将诗学观念与接受主体、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在阅读、批评、写作诸环节的展现相结合，建立起一种以诗歌的接受史为视角，用接受范式来整合多元材料的论述模式，进而架构起历史与逻辑相互结合的理论体系。

第一章 概说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诗学的社会背景 / 1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诗学的流变历程 / 8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诗学的基本特征 / 18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诗学的地位与影响 / 25

第二章 魏代诗学：文以气为主

第一节 五言诗的发展与诗学的自觉 / 30

第二节 人物品鉴与才性批评的兴起 / 40

第三节 曹丕与《典论·论文》 / 48

第四节 曹植诗歌及建安诗学的审美特征 / 59

第三章 两晋诗学：从诗缘情到诗体道

第一节 张华：从言志到言情的中介 / 70

第二节 《文赋》：诗缘情的界碑 / 79

第三节 走入玄言与走出玄言 / 87

第四节 两晋总集与诗学

——挚虞《文章流别论》与李充《翰林论》 / 97

第五节 两晋子书与诗学

——葛洪与《抱朴子》 / 106

第四章 南朝诗学（上）：诗美的甄别与寻求

第一节 声律论的诗学意义

——以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为纲领 / 115

第二节 “文笔说”的诗学影响 / 125

第三节 永明诗学的基本观念与审美特征 / 134

第五章 南朝诗学（中）：流派的冲突与交汇

第一节 新变派的理论纲领

——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 / 142

第二节 审美新变派的代表

——萧纲《与湘东王书》及其他 / 149

第三节 国史复古派的代表

——裴子野与《雕虫论》 / 163

第四节 儒学折中派的核心

——萧统与《文选》 / 175

第五节 萧绎与萧统文学观的异同 / 189

第六节 儒学折中派的旗手

——刘勰与《文心雕龙》 / 201

第七节 儒学折中派的异调

——钟嵘与《诗品》 / 216

第六章 南朝诗学（下）：体物为妙与复归缘情

第一节 体物为妙：南朝诗学的新路向 / 232

第二节 宫体：从缘情到体物的新变 / 239

第三节 大而化之：徐陵与《玉台新咏》 / 248

第四节 缘情：南朝诗学的复归之路 / 256

第五节 “吟咏情性”

——南朝诗学对汉代诗学命题的改造 / 265

第七章 北朝诗学：融合与回归

第一节 南北诗学的对立与统一 / 276

第二节 折中古今 融通南北

——颜之推《颜氏家训》 / 282

第三节 风骨、辞采、声律的磨合

——通向唐代诗学的道路 / 289

主要引用书目 / 295

第一章 概 说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诗学的社会背景

以王朝盛衰更迭划分中国文学，是文学史家常用的方法。因为，旧王朝的消亡，新王朝的诞生，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矛盾合力的结果，是历史的标点符号，亦形成文学发展的自然段落，预示着上一卷的结束，下一卷的开始。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一幅特殊的卷帙。它起始于汉献帝初平元年（190），结束于隋的统一（589），历时约四百年。说它特殊，不仅因为它在时间跨度上比以后的宋代、元代、明代、清代文学都长，还在于它的历史空间更为复杂。

纵观魏晋南北朝四百年，可以分成几大历史板块：

一是汉、魏的嬗代。东汉末期，曾经像汉大赋一样壮丽辉煌的汉王朝终于气数已尽，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擅朝政，排斥异己，争权夺利，互相倾轧，造成社会政治的黑暗与腐败。激烈的土地兼并使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连年对羌族的战争耗空了国库，在自然灾害的诱发下，公元184年，爆发了以张角为首的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起义虽然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镇压却直接导致

了董卓之乱。紧接着的便是一场军阀混战，混战的结果是更大规模的兼并。经过约四十年的战争，终于形成了相互对峙的三大政治军事集团：占据中原势力最大的曹魏集团；以长江为界割地而治的孙吴集团；以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刘蜀集团。

曹操死后不久，公元220年、221年、222年，曹丕、刘备、孙权分别在洛阳、成都和建业（今江苏南京）称帝，至此，一统的大汉帝国分裂为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曹操《蒿里行》），战乱所造成的悲惨景象，就成了诗人们悲慨的对象。

二是魏、晋的嬗代。魏明帝曹睿临终托孤，大权旁落司马氏手中。在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斗争过程中，曹爽兄弟、何晏、丁谧、李胜、桓范、毕轨等都被诛灭三族；此后屠杀的规模更大，夏侯玄、李丰、嵇康、吕安等都成了牺牲品。正所谓魏、晋代变之际，名士少有全者。“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诗》），名教下的高压政策，使得以阮籍为代表的正始诗歌成了晦涩的谜语。以曹、刘、孙为代表的魏、蜀、吴三大政治集团斗争的结果是重趋统一，三国归晋。

三是西晋的内忧外患。内乱源自晋初的大封宗室，由于赋予诸王经济、政治、军事大权，致使“机权失于上，祸乱作于下”（见《晋书·八王传》）。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长沙王义、东海王越等为谋夺中央最高权力，不仅互相残杀，甚至不惜引进北方少数民族军队为援，破长安，掳洛阳。这就是晋武帝死后持续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同时，西北边陲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乘机南

侵。内外交困中，西晋从晋武帝司马炎建号称帝至晋愍帝长安出降，只统一了五十二年便走向了灭亡。西晋灭亡以后，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渡江，改建业为建康，在南方建立了偏安江左的东晋政权。

四是南北对峙。东晋建立不久就有王敦、苏峻的叛乱，此后又有几次不成功的北伐，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进一步奠定了南北对峙的格局。东晋末，又有孙恩、卢循的农民起义，时间长达十二年之久。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东晋王朝虽还延续了九年，但已名存实亡。在战争中攫取了军权的实力派人物刘裕，先是缢死“寒暑不辨”的晋安帝，两年后又废晋恭帝为零陵王，自立为帝，国号宋。经历了一百零四年的东晋王朝至此灭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东晋已经是寿命最长的一个朝代了。

宋建国后不久，就和统一了北方的北魏进行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争，双方耗损国力，损兵折将；宋统治集团内部，宗室父子、兄弟、叔侄之间的互相残杀也同时持续了二十多年。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统计，刘裕有“九子，四十余孙，六七十曾孙，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可见其屠戮之惨烈。内讧和外患终于导致了宋的覆灭，王朝前后凡历六十年。公元479年，掌握军政大权的萧道成废宋顺帝自立，改国号为齐。

齐同样面临内忧外患。萧道成死后，子齐武帝萧赜即位。萧赜的太子早死，围绕继承权的争斗又演为一场血腥的屠杀。其间经历郁林王萧昭业、海陵王萧昭文、齐明帝萧鸾、东昏侯萧宝卷、齐和帝萧宝融数次更替，而后由萧道成的族弟萧衍在襄阳起兵，攻占首都建康，受禅称帝，改国号为梁。齐仅历二十二年，是六朝史上最短命的王朝。因此在诗学史上，真正的齐诗人不多。诗学史上齐梁连称，不少齐诗人都入梁，成了梁

诗人。

梁朝建国历五十五年，比齐长三十三年。梁的祸患根源在于接受了东魏大将侯景的投降，不久即酿出“侯景之乱”。“侯景之乱”不仅动摇了梁王朝的根基，而且对江南的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侯景乱后，宗室诸王争权夺利，内讧同样困扰着梁朝的宫廷，并且出演得更为惨烈。

萧衍有八个儿子，昭明太子萧统早死，按照惯例，应该由长孙继位，但梁武帝立次子萧纲为太子并继王位，引起萧纶、萧绎、萧纪等兄弟的不满。萧纲在侯景之乱中被杀，诸王纷争并起。公元552年，即侯景覆灭的同年，萧纪在成都称帝，萧绎在江陵称帝。公元555年，萧詧灭萧绎后称帝建立后梁。梁宗室兄弟叔侄之间，为置对方于死地，不惜投靠北齐、西魏、东魏，借用他人力量铲除异己。公元555年，大将陈霸先在建康拥立萧绎少子萧方智为帝，两年后废萧方智自立，改国号为陈。

陈建国后，统治者逐渐削平敌对势力，缓和矛盾，轻徭薄赋，发展生产。至文帝、宣帝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形势都一度好转。只是时运不济，北方已经出现了统一强大的北周。公元581年，控制北周军政大权的杨坚废去年仅八岁的静帝宇文衍自立，改国号为隋。公元588年，即隋灭后梁的次年，隋文帝下诏伐陈。

十月，杨广率五十多万大军，浩浩荡荡，分八路南下，军容甚盛，所谓“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见《隋书·高祖纪》）。第二年正月，隋军轻易拿下了陈都建康，俘虏了会写诗，懂音乐，却不懂打仗的陈后主。至此，陈朝灭亡，六朝终结。

与上述南朝的历史相交叉，北方先由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

魏，继而东魏演变为北齐，西魏演变为北周，北周又演变为隋。灭陈是隋一统天下的最后一场战役。隋的统一，结束了历时四百年的漫长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弄清这四百年的历史，理解诗人悲惨的命运，就会对魏晋南北朝诗学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并且可以了解到，作为诗学背景的四百年大动乱，在形成魏晋南北朝诗学复杂性格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不妨以《诗品》为例，通过《诗品》品评的诗人，看一看诗学发展和时代板块之间的关系，了解一下魏晋南北朝动乱的社会给诗人和诗歌创作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诗品》一共品评了自汉迄梁的一百二十三位诗人。除了上品的“古诗”和汉代诗人（上品二人、中品二人、下品三人）外，在本节所述的魏晋南北朝范围内（至梁代为止），共品评了一百一十五位。

这个数目，基本上包含了由魏迄梁所有重要的诗人，并以魏代的曹植、刘桢、王粲，西晋的陆机、潘岳、张协，刘宋的谢灵运、颜延之为轴心，组成了汉、魏、晋、宋、齐、梁诗学发展的历史架构。

但假如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一百多位诗人的身世，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诗人是被关、被杀，遭遇不幸，死于非命的。

其中“上品”被杀的有陆机、潘岳和谢灵运。魏晋南北朝诗学的三根主轴，其中曹植历经磨难自不必说，最令人吃惊的

钟嵘《诗品序》：“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

是，有两根主轴（陆机、谢灵运）是中途夭折的。

“中品”诗人在各种祸乱中被杀的有嵇康、张华、何晏、王赞、陆云、石崇、曹摅、刘琨、卢湛、郭璞、谢世基、顾迈、戴凯、谢混、袁淑、王僧达、鲍照、谢朓等人，几乎占了“中品”总人数的一半。“下品”诗人被杀的更多。魏晋南北朝诗坛，充满了血雨腥风。

这里要说明两点：其一，有些诗人如曹植、阮籍、陆厥等，虽犹鱼游沸鼎，燕巢危幕，但只要不是被杀，就不统计在内。即使像陆厥那样因父亲陆闲被诛，弟陆绛求代死并见杀，本人也被关进监狱，虽遇赦释放，终感痛而卒，也不计算在内。

其二，在这一百一十五位诗人中，有不少诗人，特别是“下品”诗人，不知生卒年月，生平事迹亦不详。如果把这个因素也考虑进去，相信这个时期被杀的诗人会更多，比例也许将近总人数的一半。诗人在此期所遭受的厄运，远甚于先秦、两汉以及后来的唐、宋、元、明、清，战乱及暴政对他们的戕害甚至比明、清的文字狱更为惨烈。

从时代的接续关系上看，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大致各有四百年。魏晋南北朝四百年接在两汉四百年之后，仿佛成了汉代的尾巴，收容了汉末所有的混乱。各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在汉代形成、潜伏、酝酿，然后到魏晋南北朝总爆发。前四百年的板滞与凝固，稳定和僵化，演绎出了后四百年复杂多变的形势，四分五裂的政体，犬牙交错的战线，动荡不宁的社会，以及尸横遍野的惨景。这一时期的混乱，不仅与两汉四百年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形成强烈反差，且与其后繁荣富强的唐代社会形成鲜明对照。

夹在比较稳定的汉、唐板块中间，作为过渡阶段的魏晋南

北朝诗学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向前发展，并呈点、线、面展开；其间过激的思想，离经叛道的理论，放荡的行为，在激烈变动中逐渐成熟起来的诗学观念，等等，所有正面和负面的东西都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它鲜明独特的诗学性格。

这些性格，从纵的方面说，是各呈风貌。魏有魏的特点，晋有晋的风格。魏的“文气说”代替了汉的“言志说”，晋的“缘情说”又发展了魏的“文气说”；而两晋也有不同，东晋的“诗体道”补充着西晋的“诗缘情”。至宋、齐、梁、陈，更由“缘情”走向“体物”，又复归“缘情”。可以说，魏晋南北朝诗学是一个不规则的多变的统一体。

从横的方面说，这种独特的性格由几方面的作用交汇而成。一是魏晋以来的战乱，冲破了原来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思想的藩篱，使被束缚已久的社会能量得到了释放；二是这一时期形成的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以及社会对五言诗歌美学普遍的接受；三是中西交通勃发，佛学不断传入，南北文化对流，儒、佛、道思想交融，使得新思潮涌动，新观念生发，新思想诞生。魏晋南北朝的诗学，就在这几方面的交汇中，在新时期新的诗学实践和诗学理念之中得到发展，并铸就了自身在中国诗学史上的辉煌。

宗白华先生在《论 世说新语 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与前面的汉和后面的唐相比，呈现不同特点的魏晋南北朝社会，倒是与春秋战国时期有某些相似之处：同样的礼崩乐

坏，纲纪松弛；同样的动荡不宁，天下大乱；同样的思想自由，争鸣创新。而汉、唐之间也有些相似，那就是与稳定、繁荣、强盛连接在一起的社会秩序和思想秩序。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上，虽然每一次政权嬗代，都要以许许多多生命的死亡，以及罹难文士诗人未及宣示的创作能力和未成熟的诗学观念的灭失为代价；而每一次激烈的社会变动，就像熊熊燃烧的森林大火。但是，当大火熄灭在自己的眠床上以后，焦灼的土地又会重新显露出勃勃生机：草仍然生长，花仍然开放，鸟仍然歌唱，而且，开出前代没有的新绿，唱出前代所没有的新歌。苦难与成长，大火与涅槃——魏晋南北朝诗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淬炼出了自己凤凰高翔的诗学性格。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诗学的流变历程

如果从整个中国诗学史的角度看，魏晋南北朝可谓是诗学观念的新变时期。围绕着什么是诗歌，诗歌应该写什么，诗歌应该用什么语言（风格）写，以及诗歌的功能有哪些等一系列问题，诗学展开了积极的探索与大胆的实验。按照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答，魏晋南北朝诗学因此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色。大致而言，这一时期的诗学思潮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魏之交——西晋时期

从汉末古诗（《古诗十九首》、苏李诗）开始，诗歌开始走出了言志、政教的樊篱，向着重抒情、重词采的方向发展。那种“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文心雕龙·明诗》）的诗风给诗坛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这是对汉代僵化、板滞诗风

的反动，显示了诗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建安诗章大都具有慷慨悲凉、壮怀激烈的特点。从内容上说，建安诗歌中的确回响着建功立业的主旋律，仍然带着颇为浓厚的“言志”色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言志又是同诗人个人对人生、命运的思考与感慨结合起来的，因而又有着极为浓烈的个人感情色彩。此外，大量存在着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一类的诗歌，其个人感情的抒发就表现得更明显了。因此，可以这样说，抒情的个性化是其时诗章的一个突出现象。而在文辞方面，建安诗歌则有着明显的趋向华美的势头，其中曹植的作品最能体现这种特色。他的诗不仅锤炼字词、注意语言的色泽之美，而且还能顾及到声韵的和谐，在修辞技巧方面可以说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也开了后世注重形式技巧的风气。人们说建安诗歌具有文质兼备的特点，这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我们若从历史的角度动态地来看，又会发现建安诗歌还呈现出一种由质趋文的倾向。正始诗歌使得这一过程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曲折。正始诗歌仍保持着抒情的传统，但同时开始在诗中引入哲理，诗风也变得平淡起来，成为后来玄言诗的先导。这里既有正始玄风的影响，又与质文代变，追求陌生化的审美心理有关。然而宏观地看，正始诗风前后不过二十多年，在这一阶段中只是一个小插曲，它不可能改变诗歌重抒情、重辞采的潮流。果然，接踵而来的太康诗歌就以更大的力度把诗歌推向了缘情绮靡的高峰。与建安诗歌相比，西晋诗歌所抒之情更偏于日常生活，其感情基调则柔弱感伤。羁旅行役、思乡怀人、寥落失意、儿女情长成为当时诗歌的主要内容。在艺术方面则以称艳繁缛为其基本特征，尚绮丽、重文采、刻绘精工、典雅华美，尽管人工的痕迹比较明显，却也的确增加了诗歌的美感。刘勰所谓“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